

第一章

冷战后日本围绕联合国外交的政治思潮

日本冷战后的政治思潮是其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其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政治思潮领域广泛，是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的、多领域的大国思想舆论。这些舆论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生活，并为日本的“大国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冷战后的日本政府的联合国外交和日本政治思潮有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在日本引发了向何处去的大论战，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场论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也对日本的国家新的目标定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本新的国家目标定位的过程中，其重大的外交目标也深深地带着政治思潮的烙印。

一、极端民族主义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从两极结构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日本从美苏对抗的“走卒”而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日本新的社会思潮被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激活了。古老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又死灰复燃，其代表性的人物是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他们主张改变对美国一直唯唯诺诺的态度，要敢于对美国说“不”，但也充满了“日本民族优秀”、“日本将主宰世界”的狂妄意识和词语，声称日本是“亚洲之中心”。这种思潮对日本的联合国战略所持的立场是，日本既然是亚洲的当然领袖，日本在联合国中就自然而然地应该取代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面对日本今天还不是常任理事国的现实，“大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并非真心实意支持日本所致。如果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日本就应该退出联合国。在今天，“极端民族主义”在日本非常有市场，石原等人的著作在日本非常畅销。但是从长远看，“极端民族主义”毕竟不能说是有关前途的政治思潮，其极端性和误导日本的国家目标的做法早晚会被日本人民和一切有识之士所唾弃。

二、新保守主义

“一国和平主义”是指只安于日本不卷入战争，保持本国和平的思想。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是相对冷战时期的“一国和平主义”而言，认为日本已经不可能在维持“只考虑自己”的国家目标了，日本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发挥作用。提法因侧重点不同也有一些区别，如：加强

多边外交的“联合国中心主义”、树立日本式政治大国形象的“国际协调主义”、追求日本经济稳定国际环境的“全球和平主义”、发挥日本独自性的“能动的和平主义”等等。小泽一郎是“新保守主义”的集中性代表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泡沫经济破产，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消除腐败等弊端，适应新的形势，日本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小泽一郎等鹰派政客利用日本国民要求改革的愿望，将成为“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右倾思想糅进“改革”的药方，使改革的方向偏转。实际上这种主张是对战后长久以来形成的自民党传统保守主义主流思潮的修正，可以说是比自民党传统更“右”的“新保守主义”。^①但是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主义，实际上都是日本为了急于早日证明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能力为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世界性大国。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国，国际社会理应充分满足其各种利益的要求，因为这是日本可以为世界继续作出“国际贡献”的基本条件。对此，日本学者曾对所谓的“国际协调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自民党作为自卫队海外派遣正当化的根据，是‘国际贡献论’”。日本保守政治家的所谓“只出钱不流血汗，国际上不允许”以派遣自卫队，进行国际性的贡献，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国际协调等等各种各样的逻辑，来制造派遣自卫队合理化的舆论。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海湾战争所体现的“国际协调”，“不过是意味确保中东石油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共同得到保护”，“所谓对日本国际性的批判，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批判的别名。没有听到亚洲国家和阿拉伯人民的反对之声，受到这些国家人民

^① 参见薛君度、陆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

所尖锐批评的，是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和海外派兵论”。^①

冷战后日本之所以出现新保守主义思潮，主要原因有：

第一，反映了日本统治者希望成为政治大国，发挥全球性影响之强烈愿望。宫泽内阁“建立新的世界和平秩序时代”的日本国际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就是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第二，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使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既不会允许美国独霸天下，也不会同意日美欧主宰世界。日本自知自己不具备独立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影响力，惟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行日本之国家利益，才是日本推动全球战略上上之策。

第三，海湾战争为日本政治家鼓吹和实践“新保守主义”提供了绝佳良机。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发动了一场力量对比反差极大的大霸权主义对小霸权主义的悬殊的立体战争，^②大霸权主义把小霸权主义赶出了科威特。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从此，日本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国和平主义”的国家目标，美国要求日本既要出钱也要出人，而日本统治集团则根据国际社会的要求，借机扩大包括军事领域中的“国际贡献”。

第四，结束所谓“被动外交”的强烈愿望的驱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上为2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约为5万亿美元，西欧占5万亿美元，日本占3万亿美元。日本已被视为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治家认为，日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被动外交必须结束。应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发

（日）岩本熏：《冷战后的世界与日本——政治评论 1990—1994》，晃洋书店，1995年版，第197～198页。

虽然这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进行的战争，但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追求冷战后自己主导之单极世界的第一次大演习和大示威。

达民主国家共有价值的那种更加和平、更自由、更富裕、更适于人类的世界；并为此进行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相互帮助以及相互合作的国际社会，建立这样一种体制。^①

1991年1月30日，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在他的“肩负大国责任的日本”演讲中提出对日本的“绝对和平主义和一国繁荣主义”应该进行如下冷静的思考：“第一，对国际秩序的形成必须承担重大责任的日本如果对明显的侵略行径置之不理，而强调所谓的绝对和平主义，这没有肩负起日本的责任，第二，把建立国际秩序的责任交给别人，只要日本和平就行，只要日本繁荣就行。这种和平主义和一国繁荣主义在国际上行不通。第三，在很多国家下决心为保卫和平要流血的时候，如果日本说‘费事’、‘脏’、‘危险’只出钱不干实事这不行。最后一点，在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国际合作时，在宪法允许的非军事方面或者是人道方面，不应否定政府在人员合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② 栗山尚一的言论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滥觞的政治宣言。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另一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学者佐藤诚三郎。佐藤所编的《冷战后》一书集中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构想：美国存在严重的内政与外交之困难，日本要加紧转变观念，确立自己在冷战后对世界事务之领导权。他否定《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的著名定义，认为它是“绝对和平主义”的宪法观，要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为了保卫日本的和平和不受“侵略”，日本要突破不能“行使武力”的限制，并要把自卫权扩大到“集体性自卫”和“集体安全”上去。因此日本不但要参加维持和平行动，而且要创造“惩罚性”和“奖励性”的“遏制体

^① （日）《肩负大国责任的日本》，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在纪念《每日新闻》创刊119周年的演讲，见《每日新闻》，1991年2月19日。

^② 《每日新闻》，1991年2月19日。

制”——以黄油加大炮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国际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1995 年 1 月 14 日一期题为“日本新民族主义者”（这里实际上是指日本的新保守主义）的文章认为，日本信心的不断增长促进一种新民族主义的滋长，其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为日本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经济上强调“日本独特的经济模式”相对于美国模式的优越性；政治上日本领导人更愿意抵制贸易压力并公开提出“民族利益”。这种新民族主义者强调日本特性，力图将日本经济成功的根源追溯至明治维新之前，认为亚洲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将取代西方自由主义。但新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民族主义，它不同于旧的感情化的民族主义，它未获军事上的支持并为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所抵消，因而不大可能出现 30 年代^①那种情况。

《经济学家》明显地袒护日本的民族主义。这反映所谓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的共同的趋向。从中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民主和平论”的影子。日本的新民主主义真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民族主义”，而不同于“旧的感情化的民族主义”，它真的“未获军事上的支持并为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所抵消吗”？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国和平主义”的批评者。他说：“我认真地完整无缺地读过联合国宪章，了解到（联合国的）一切行为均是以联合国成员国的同意为基础，因此，在他国领域不以动武为目的的范围内，以国际贡献为目的，自卫队原则上在公海和公空执行任务我不认为违反宪法。以中国为例，中国虽然是常任理事国，但在海湾战争中没有派出过军队，而且也未对波斯尼亚出过兵，只是在柬埔寨派遣了工兵。我不理解为什么因存在宪法第九条问题，日本就被严重束缚住而反应过敏。这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怯懦的一国

^① 以下书中出现年代除明确世纪外，均为 20 世纪。

和平主义的思想的太多的影响，致使日本按兵不动”。^①

小泽一郎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和中曾根相似。他也提出如下主张：第一，改革联合国，使之变得更强有力。现在的联合国机关，是战胜国为了构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而建立的机构，这必然要符合战胜国的国家利益。安理会之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的制度是最突出的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制度使联合国陷入了机能瘫痪状态，在探索新秩序构筑的今天，像这样的联合国的机构，当然有必要进行改革，日本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改革的策划中去。第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积极地有效利用联合国舞台，和联合国成为一体而展开活动。为此，不可把美国赶进绝对的孤立主义中去，如果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负担感觉厌烦，只以本国眼前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其结果，如果联合国变得虚弱下去，那才是日本外交真的出现了破绽。只有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有能力对美国提供当之无愧的合作。因此日本应该表明这样明确的观点。^②

小泽观点的核心是强调改革安理会的“否决权”及日本与美国“共同合作加强联合国”，这可以说是“日美合霸”论向联合国的延伸。

面对新和平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的主张，“积极的一国和平主义”^③者并没有沉默，他们也拿起自己的理论武器对新和平主

^① (日)中曾根康弘：《想对日本人说的话——生活在 21 世纪的诸君》，PHP 研究所发行，第 85 页。中曾根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国际贡献度低，他认为中国不愿意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而日本不应该学中国，相反应该补上这个空白，以显示日本的国际和平主义。

^②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第 129~130 页。

为什么称浅井基文等为“积极的一国和平主义”者，是因为此派并不一概否定“一国和平主义”的积极面，他们认为“一国和平主义”从积极的方面看是战后以来避免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并培养了日本国民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和平主义意识和感情。

义的批判进行反击。这可以从浅井基文的《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一书中找到答案。浅井基文对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理念并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国和平主义”并不是日本人民的错，而是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进行政策诱导的结果，自民党政治乃是“一国和平主义”的首恶。^①

关于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浅井基文不同意小泽一郎的可以使用武力之说。他认为“日本不能参加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即使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使用武力。特别是安理会一般是在被大国意志支配的情况下，从被联合国作为军事性强制措施处置对象国一方来看，越来越多的情况正是国际间的争端，日本参加这样的联合国行动，从宪法上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② 浅井基文对小泽一郎打着对联合国的军事贡献而进行曲解宪法体制“改革”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形成强烈的‘大国主义’思想。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宪法第九条仅仅是个障碍之物。他们当中多数人至少在现在希望强化日本作为与美国步调一致的大国的活动。然而，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要求并无保证今后会局限于联合国的框架之内。小泽之类的改革论者满足于假‘协助联合国’之名来主张军事国际贡献的正当性也不过是权宜之计”。^③

“积极的一国和平主义”者对新保守主义者一味追求常任理事国地位提出批评，认为“所谓日本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乃是政府、自民党（以及有着强烈的大国意识、并立志‘改革’的其他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见，与我们日本国民毫无关系。

^① （日）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1版，第9页。

同^①，第153页。

同^①，第216页。

为什么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对最基本的问题不作任何回答，只是一味地被‘获得作为大国的证明’之类的想法驱使着，甚至不惜蔑视宪法之宗旨——小泽之类的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真的能简单视而不见，任其蛊惑人心吗”^①

三、“尊重联合国主义”

日本在加入联合国时曾经提出过“联合国中心主义”，并把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首。在联合国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日本在冷战时期执行了一个符合其利益的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达到了反华排华的政治目的。当它在 70 年代初的反华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受挫之后，便开始执行“联合国冷淡主义”的外交。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冷战的终结。随着 90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冷战后时代。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起步阶段，联合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海湾战争、柬埔寨和平问题上，联合国的独特作用尤为明显。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之下，日本结合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再次提出“联合国中心主义”。1991 年 8 月 5 日，日本首相海部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说：“国际社会团结在联合国之下，克服了海湾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伦敦 G7（发达国家财长与中央银行总裁会议）表明重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为战胜冷战格局的困难指明了健康方向，同时也符合日本一直提倡的联合国中心主义立场”。^② 为了实现“联合国中心主义”，日本采取了三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尽可能留在安理会内，获得“准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决策；第二步，要求取消联合国宪章

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第 121 页。

② （日）外务省编：1991 年版《外交蓝皮书》，第 389 页。

中的“敌国条款”，以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第三步，推动安理会改革，成为常任理事国。很明显，冷战后的“联合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在联合国中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的代名词。

“联合国中心主义”的重新提出，表明它是作为日本国家对外战略的重大政治理念，在日本的政治思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中心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一理念从日本加入联合国就已经提出，今天只是重提；第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基本上均认可这一理念，从未形成强大的对这一理念进行挑战的情况；第三，对联合国一定程度的盲目崇拜和对联合国作用的理想化，指望联合国可以弥补日本宪法否定的参加集体自卫权^①之不足。

当然，也正因为上述三点，日本也有人对“联合国中心主义”提出质疑：认为只追求本国和平的“一国和平主义”，不但会有来自世界对日本利己主义的批评，而且对等的日美同盟也难以维持下去”；“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把联合国决议视为万能的想 法，如果是 以美、俄、英、法、中五大国的否决权的存在为前提的话，未必是现实的”。不过，“根据联合国宪章确定的正规的联合国军如果启动的话则另当别论”。“但是，正如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之际的多国部队一样，纵然根据联合国的决议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不能修改宪法，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就不能参加伴随着武力的军事行动”，因此，日本“与其采取联合国中心主义，还不如采取联合国尊重主义”。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联合国尊重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在日中关系如果健全且正常，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如果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对于为了把

因特网。网址：<http://www.phoenixtv.com/yaowen/2255.htm>，2001年3月23日，执政的自民党防御委员会决定建议日本政府修订宪法诠释法，承认日本有集体防御权，以此作为加强与美国防御合作的努力之一。

中国作为当事国的有事处理而从美军基地出发的美军直接战斗行动，应该说‘不’！”“到 2010 年，日美安保体制虽然仍然是基础，但是应该以日美中俄为基轴，摸索在东南亚构建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眼下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强化和充实 ARF 的机能”^①。联合国尊重主义者否定五大国的否决权，实际上就是否定联合国，当然它的有些想法是积极的，如不看好日美同盟在未来的作用，比较看好大国之间的协调作用和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日美中俄为基轴”的设想，对地区安全机制的作用也持肯定的态度。

从“联合国中心主义”的理想主义倾向是否未来会向现实主义的“联合国尊重主义”演变，这当然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可以肯定，日本将会继续保持和扩大其联合国外交的现实面，而缩小其盲目性和被动地追随美国。

四、“软否决权”构想

早在东京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日本就有人主张在会议上提出“联合国改革”，日本要当常任理事国。如果日本的主张得不到回应，日本就应该在交纳联合国会费问题上讨价还价，拒绝及时交纳会费。认为这才是外交。^②这恐怕是日本最早的“软否决权”的构想之一。

“软否决权”构想显示了一种新的“日本中心主义”的联合国外交发展势头。可以这样认为，联合国的财政困难，是联合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难题，由于联合国经费上的长期困难、财政上的

^① （日）山崎拓著：《2010 日本实现》，ダイヤモンド社出版发行，1999 年 7 月 15 日第 1 版，第 7~8 页。

^② （日）横尾俊彦：《创造国际机构》日本松下政经塾《塾报》1993 年 7 月号。

危机导致联合国不得不挪用联合国的维和经费用于联合国职员的工资上。正因为联合国存在如此严重的财政困难，有些日本人感到这是日本向联合国发难和施加影响的最为有利的机会。日本学者日下公人提出以利用日本在联合国占有 20% 会费的财政地位，在联合国实行所谓的“软否决权”。他认为这种地位是现实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完全不需要是否拥有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他说：“对加入常任理事国的特别热心的是外务省。确实，如果从经常穿梭于联合国大厦之中的人来看，有官衔那自然是令人高兴的，工作也很愉快，但是为此而花掉日本大把的钱，这就太显得愚蠢和糊涂了。本来，外务大臣和首相为了解世界各国的意向和动向而依赖于外务官员，这本身就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即使不了解，最后的支票是来自日本，是‘行’还是‘不’，如果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判断，就没有必要去了解。第一，因为日本已经拥有了事实上的否决权，所以没有必要当常任理事国；第二，日本是负担联合国活动费 20% 的强大支持者。只要日本在捐款上显得多少有些迟疑，日本就受到世界注目，就想知道日本的真实意图，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具有了‘软否决权’；第三，如果是真正理想的联合国，那么，从根本上讲，视和平友好亲善为第一主义的日本的经济力量达到世界 GDP 的五成（50%），特别是日本军队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创造联合国”^①。日本学者的“软否决权”构想虽然不代表日本官方的联合国战略思想，但这难道不是一种“日本中心主义”的联合国观吗？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联合国的态度，也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对外交决策者的不满，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权力膨胀的要求和急于

参见（日）日下公人著：《一问百答》，PHP 研究所，1999 年 3 月 4 日出版发行，第 262~264 页。

充当大国霸权主义的傲慢心态。可以说对政府也构成了一定的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压力，而且今后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者的思考模式。

日本年轻的众议员河野太郎是日本有名的主张利用日本在联合国的高额会费问题对联合国实施“软否决权”的人。他提出了一个名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框架决议通过促进法案纲要”构想，为了促进“纲要”的实现，要求在联合国提出日本：1. 修改包括常任理事国数扩大的安理会框架的规定的安理会改革的决议案，在直到联合国大会通过之前的期间，日本对联合国及相关机构的任意捐款，要及时采取削减的措施；2. 日本对阻止安理全框架决议案通过、要求对扩大常任理事国的规定的执行延期等决议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情况下或被通过的情况下，内阁对阻止安理会扩大方案通过的提出国或赞成国且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象国的，要及时采取削减 ODA 的措施；3. 以上两个措施的削减幅度比上一年少 10%；4. 在实施以上措施的时候，内阁要及时向国会报告。^①这就是“河野法案”。

五、“协调下的霸权”

冷战后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协调下的霸权”（*Pax consortis*）概念。他们认为，今天的世界是“协调下的霸权”的世界。随着世界的多极化，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在国际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具备实力和责任能力的主要国家间的协调成为必要。可以说，真正的“协调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冷战时代，是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维持世界秩序。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有被称之

因特网。网址：<http://www.taro.org/kokurenkaikaku.html>，河野太郎个人网页。

为维持“国际公共财产”的世界秩序、提供各种体系而肯定性地抓住的“霸权稳定论”。但是，在冷战终结后的世界中，两个霸权国衰弱了，今后，将过渡到是主要 G7（发达国家集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P5）等的有力量的国家各自带来自己擅长的“国际公共财产”，进行合作保持秩序的想法上，这就是“协调下的霸权”的想法。同时，作为供给这种合作的场所，无论是一时的，还是长期的，都必须对联合国的存在价值进行再认识。^①

当然，日本提出的“协调下的霸权”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不成熟的，其大致含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是几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唱主角的时代，包括日本在内的大国应该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起责任；没有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就没有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日本是拥有巨大“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日本能够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应该受到重视，关键是日本在联合国地位得到提高。

日本的“协调下的霸权论”也遇到了来自规制主义的批评。规制主义的概念，正如《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的作者所解释的，即“通过发展多边规则、协议和机构调整国际关系”，“是一种长期的协约关系”，这种关系将导致“非正式同盟关系”的存在^②。规制主义的观点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组织的发展的很多新情况，比如说联合国 50 多年来，它“总共制定（或参与修订）和通过了 300 多个条约和公约，从核武器到人权

（日）综合开发机构预防外交研究会，森本敏、横田洋三编著：《预防外交》，国际书院，第 50 页。

参见《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中译本）前言，（美）理查德·N·哈斯著，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问题，从外层空间利用到海底开发，从老龄问题到妇女、儿童权益等，各方面均已涉及”。^①“规制主义”强调的是现有联合国安理会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定更加规范的国际规则来对世界进行管理，并可以充分达到协调各种利益的目的，如果联合国通过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使现有的安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事务将更加难以协调，美国的这种观点的好处是，它愿意维持一个富有效率的现行机制，并通过完善新制度来达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然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观点，目的还是为美国的“一超”地位服务。而日本学者强调的“协调下的霸权”，实际上是强调安理会结构性的变化，它认为，只有在日本、德国，以及第三世界中的一些有实力的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并且在政治上也和美国有相同的决策地位，国际关系才会取得新的平衡并有效实现“国际协调”。

六、建立南北共生的非霸权世界

持这种观点的日本学者认为，作为今后世界前进的方向，使第三世界进一步贫困化的欧美日共同霸权，或者是欧美日霸权竞争靠不住，应该考虑选择支撑南北共生的非霸权体制。日本在今天常常使用“国际贡献”词语的时候，应该坚决主张以一种极其善意的方式，回避日美欧的霸权竞争，而和美国进行合作。但是，日本和美国西欧的合作，如果是建立在越来越袒护只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的基础上的话，南北的大分裂就不可避免。现在的安理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管理秩序，南北对抗正在加剧之中，联合国不过只是被当作利用的工具。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

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54页。

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不满就会扩大，迟早联合国会重蹈国际联盟之覆辙。日本也有可能像曾经脱离国际联盟一样而退出联合国。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像过去的日本那样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但是如果对这些国家采取大棒政策，在发展中地区整体中，就会遇到针对“北方介入”的反霸权民族主义的反弹，就会使联合国的威信降低，结果就会落入霸权国的圈套之中。同时，在经济方面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控制就会继续恶性膨胀，贫富悬殊就会加剧。加之如果联合国站在北方国家的利益上而介入南方国家的争端，一方面允许北方国家搞军备扩张，而另一方面则强迫南方国家裁减军备，那么完全可以预料南方国家将会纷纷脱离联合国。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处于压倒性的大多数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等就有一种脱离联合国的强烈的倾向。此时，两国就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了出来。如果是这样，北方国家恐怕就不会挽留南方国家。宁可选择只和 G7（发达国家财长与中央银行总裁会议）、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发达国家支配国际社会之道路。如果这样的话，在国际政治中，调停南北之间的冷战，创造和平的国际机构就完全处于不可能的状态。这其中处境最为艰难的国家，就是四周为发展中国家所包围的日本。因此，日本的国际贡献，就是纠正联合国的结构和作用，重新确立联合国的正统性，使之达到建立南北共生之非霸权的世界之目标。^①

七、学术界的“联合国改革”观

日本学界的联合国改革主张可以说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要

^①（日）武者小路公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主编：《联合国的再生与地球民主主义》，1995年3月25日第1版，第117~118页。

的思想来源。一般而言，日本学者的联合国改革主张视野要比日本政府的广泛，他们不仅关注安理会的改革，也关心诸如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等方面的改革。这其中引人注目的学者有功刀达郎、横田洋三、神余博隆渡边昭夫等等，他们的学术观点概括如下：

（一）提出联合国的改革应该内容广泛，包括“人类安全”及经济社会领域的种种改革，而不仅仅只是日本政府的以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真实动机的安理会改革。最早提出“人类安全”新概念的并不是日本人。“人类安全”的概念，按照提出者的解释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不仅是国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第二，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第三，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而且是个人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的安全；第四，不仅是防御国家间的冲突，而且是防御人与人之间的冲突”。^①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功刀达郎教授认为，“人类安全”应该是联合国改革在今后的一个重点，他不主张这一定要和日本必须确立在联合国中的特殊地位联系起来考虑。他说，“1958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就说过：‘要把向今天这样如此充满着混乱的支离破碎的世界，一口气迈进世界联邦的目标是困难的。……我们必须以这样的理想为目标，不断地积累努力和实践，开拓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道路’，在此后的36年间（到2001年为43年）人类真的要开拓面向共同生活的道路了”。^②特别是由于冷战的结束，期待联合国就和平与安全，以及处理环境、开发、贫困、大规模难民、毒品、爱滋病、武器输出等众多的全球性的课题发挥更大作用。但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要说联合

^①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特别顾问哈克博士早在1993年在欧洲议会会议上阐述的新观点。参见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56页。